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 ——《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张 晚 林

(湖南科技大学 中文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作者简介] 张晚林(1968-), 男, 湖北大冶人, 湖南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1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5-0719-02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旨在揭示在“长江流域文化”这一大的地域文化中,古老的中国哲学是如何在短短百年之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进而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全书的重点和难点,都在一个“与”字上,即“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二者的关系上。显然,这一关系不是纯粹思想概念之间的逻辑推演,而是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与哲学思想发展之间的联系。因此,一个“与”字,体现了对哲学史作整体性的具体的历史的阐释。这样,“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作为全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就在所必然了。这一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并不是仅图一个新鲜,或换一种研究风格,而是想更真实地再现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体现了作者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历史视野和现实关怀。

在书中,作者着力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长江流域文化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与进程的影响:一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哲学传统,二是长江流域文化的近代变迁,三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内在差异。

从第一个方面看,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文化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传统,这种传统与黄河流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传统不同。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入世的性格,老子的哲学则是一种超越的性格。但这种超越的性格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又不同,它注重在形而上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思考。这种哲学致思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与长江流域文化相关联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至近代,这种哲学致思传统,一方面推动了该流域内的哲学家进行本体论的重建,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的哲学本体论建构;另一方面,激发了该流域内的思想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反复探讨,这在龚自珍、魏源、陈独秀、杜亚泉、孙中山、张君勱、毛泽东等人的哲学思想中各有不同的表现。

从第二个方面看,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文化对近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在于它在近代中国百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首先,长江流域率先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开展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们从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中开始苏醒、觉悟,对这一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进行思考和探讨,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寻复兴中国的道路,从而建构起能够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民族精神的新的中国哲学。其次,长江流域所展开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斗争,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展开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由于长江流域最早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阶级力量都在这里发生,因之它也成为了近代中国阶级较量、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这一历史文

化特点对近代中国哲学,特别对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长江流域那些政治风雷激荡的地区,往往也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获得了很大发展的地区。再次,长江流域的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依托条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展,长江流域成为了中国近代文教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近代的出版业、报刊及大学哲学教育均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很有特色。出版业为大量的哲学著作的面世提供了可能;报纸和杂志则为思想的论争提供了阵地;大学哲学教育则培养了大批的哲学人才,且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专业哲学家进行哲学教学与创造。

从第三个方面看,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文化固然是自成一系的区域文化,但其中又存在地域差异性,这种地域差异性的产生来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因素:或源于古代的各地域文化的传统,这些传统形成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等更具体的地域文化风貌;或源于近代的各地域文化的变迁,因为长江流域各地域进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先后不同,这便造成了该流域内各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或源于近代政治与战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各地域的政治斗争无疑会赋予各区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这些都会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具体而深刻的影响。

因此,作者在书中分别以长江流域中的上海、南京、湖北、湖南、昆明五个地域为主要对象,来展示近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发生学图景。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的疏理,准确地界定了各地域哲学开展的特质:上海在鸦片战争后最先被卷入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以及由之形成了开放的海派文化,从而成为中国新哲学的发祥地。南京既有“十朝古都”的厚重文化积淀,又直接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表现出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交汇与兼融。湖北则出现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现代化与广大农村中的传统文化并存的局面,因而既有对科学宇宙论体系的新建构,又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摇篮。湖南则由于湖湘学风的熏陶和政治风雷的激荡,成为一代又一代政治哲学家的诞生地。地处边陲的昆明,由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在此建校,在该校哲学系中集中了一批优秀的专业哲学家,因此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几个融通中西古今哲学的本体论体系都是在这里构建的。应该说,通过作者的分疏与诠释,这五个地区的哲学开展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个性,也表现出了长江流域文化所本有的共性。当然,对近代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还有四川、浙江两地,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作者未能纳入书中,不能不是一个遗憾,但作者表示,日后如有机会再版此书,将会争取补上。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的联系,还着重从哲学问题入手,作了提炼与追问。这一点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哲学智慧。因为若不作这进一步的追问和提炼,则长江流域文化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影响会因各地域的不同文化现象而显得极为松散凌乱,从而不能使人从整体上看出这一影响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文化对近代中国哲学最根本的影响在于: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以及对问题的解决。近代中国哲学在形态上的转变,其最集中的表现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提问话语。在作者看来,哲学的提问方式有两种,一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二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在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就明显地存在着两种哲学提问方式:一方面对于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作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换,这种转换使得近代中国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上多有创获;另一方面则对于那些直接来自近代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作出了思考,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大问题予以了回答。这两种哲学提问方式同时存在,相互作用,构成了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不容分割的。因此,作者对学界长期以来只关注前者而不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的一些内容根本不属于哲学论域,表示了不满。他认为,正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特殊问题进入到哲学论域中来,才使得哲学保持同人的历史文化、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才使得哲学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进而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间。在作者看来,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或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有着关联,这是理解近代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何以发生转变的关键所在。

近代中国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者认为,从逻辑上看集中体现在由抽象到具体的三个层次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但从历史来考察,这三个层次的哲学问题并不是同时进入近代中国哲人的论域中,而有一个先后秩序。这一先后秩序的形成,是由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变迁所决定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首先发生的是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因而历史观、文化观问题最先被提出。接下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便凸显出来,因而出现了不同思潮环绕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再往下,近代中国哲人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近代中国的大变局,必须重建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这就深入到对本体论问题及相关的认识论问题的探讨,而有中国哲学本体论及认识论的新建构。

《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一书通过以上这些探讨与解析,在微观上,详细而具体地阐明了近代中国哲学在长江流域的发生发展机制;在宏观上,系统而准确地把握了近代中国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作者所提出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书中的成功运用,对于我们进行哲学史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